

「2016 歷史學 研究生論文聯合 研討會」紀實

陳皓昕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多年以來，臺灣歷史系研究生自組期刊編輯委員會，從邀稿、收稿、審議、編輯到出版皆親力親為，部分刊物更出版至數十期之多，可見研究生團隊及師長們所傾注的瀝瀝心血。研究生期刊作為學生論文的投稿園地，不但可使後學有嶄露頭角的機會，更可讓參與者通過在審查、修改的過程中更趨成熟，於日後前途十分有利。然而，各校研究生期刊之審核多為一校一系之事，見識難免囿於一家之見，有鑒及此，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史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政大史粹》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史耘》三校研究生期刊編輯委員會，決定合作舉辦跨校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以為各校研究生提供切磋、交流平臺，同時尋覓相關方向的青年學者和前輩擔任評論人，以求為發表者及與會者帶來更多思想激盪，最終達致互勵互勉，在鼓舞學術風氣之餘，也有效提升國內研究生發表研究專題的能力。

2016年7月2日，歷史學研究生論文聯合研討會籌備會根據所選出的17篇論文，分為2個場地6大主題進行報告，分別是第一場地的「宮廷文化與政治」、「明代心學的演變與特徵」、「蒙書與孺子養育」，及第二場地，即此文所簡介之中國近現代史部分：「政治、權力與文化再現」和「地域、空間與論述」。茲在此簡介上述2主題共7篇論文內容及評論如下：

二、政治、權力與文化再現

第一場「政治、權力與文化再現」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暨《政大史粹》主編楊善堯主持，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胡學丞、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樊俊朗和李盈佳報告，並分別由國史館修纂處助修蘇聖雄、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邱士杰和國史館修纂處助修、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吳俊瑩評論。

胡學丞在〈蔣中正與其建民國為基督教國的誓言〉中嘗試在學界關於蔣氏信仰之原因、過程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專論蔣中正基督教信仰之影響。文中指出蔣中正從傾向佛教到受洗成為基督徒，再經西安事變脫困而堅定了信仰，逐漸成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其驚人的意志力不可否認地證明了基督教信仰係其支柱之一。文中提出也許是因為條件尚未成熟，故蔣中正未曾公開且直接明白地表示要立基督教為國教，但他一直嘗試推動基督國教化。文中認為蔣中正未能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四點：1、設立國教被認為是迫害宗教自由之舉；2、基督教在當時中國民眾的信仰上不居主流地位；3、近代中國的反宗教運動、反基督教運動使得基督教受到打擊；4、中國基督教內部不一致，如蔣中正所信仰之美以美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以末世論為教義重心，並非政治性導向。

蘇聖雄讚賞此文結構嚴謹、邏輯清晰，

其中關於蔣中正對天國的看法，旁徵博引，可見作者用功甚深，並提出五點供作者參考，以待改進：首先，在史料上，作者使用了《學記》作為參考，但裡面有被刪改之處，可能使內容失真，加上《學記》所錄只到1943年，難以用作評估蔣中正在1943年後對相關事情的看法，評論建議若要通過史料看待蔣中正對基督教的看法，國史館出版的《事略稿本》和《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皆有較高史料價值，可予利用；第二、作者提出蔣中正常以「還願」的方式向上帝禱告，指出這並不符合新教教義而近似於中國傳統民間信仰，但向上帝祈求並作出「還願」之承諾本是人之常情，在《聖經·申命記》中也有類似記載，加上新教教派也眾，難以一概而論；第三、史料文本之產生背景必然影響文本內容，如蔣中正的談話對象是軍人，則必說軍隊是國家之棟樑；如談話對象是學生，則必說學生是國家之棟樑——同理，蔣中正對基督教之讚美也因為其談話對象是基督徒之故，未必與其心中所想完全契合；第四、文中指出蔣中正曾立下「使中華民國為基督教國之誓」，然而蔣中正一生動輒立誓，實不宜一一認真看待；最後、作者認為關於蔣中正與基督教之影響的研究甚少是因為「尚屬初步」，但若考慮到蔣中正身處高位，其決定必有深刻之政治考量，基督教信仰也許能給蔣中正信心和動力，卻不一定能予現實政策的推行直接影響。

樊俊朗在〈革命的延伸——中共在香港

的鬥爭對象與策略（1949-1956）》中探討從 1949 年到 1956 年間，剛建政的中共如何在香港與各政治勢力角力，並探討其鬥爭策略。文中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北京沒有計劃立即收回香港，而繼續在香港進行統戰工作以對付國民黨，其在香港的鬥爭方式除了罷工、遊行示威等「武鬥」外，還有辦報、教育、法律訴訟等「文鬥」，這時中共與港英政府處於對抗與合作的相互矛盾之中：既有反對港英政府之行動，也會依賴港英政府作為打壓國民黨的工具。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雙十九龍暴動、港英政府將國民黨勢力基本清除後才有所改變。因此，中共並非僅把香港視為一個有待處理的問題，而是通過香港帶來豐厚的外匯收入，讓中國在抗美援朝時，亦能在禁運封鎖時走私物資到國內，所以作者認為中共對港政策基本上是以鞏固其政權為主要考量，並可視為中國共產革命的延伸部分。

邱士杰對本文之研究對象深感興趣，因為香港在 1945 年以後便成了中國重要的自由區域，不論左派、右派皆聚集此地，成為一個政治、文化複雜的地方。他在評論中對此文提出一些建議，主要有二：一是指出文章中較少用一手史料，多是二手研究，故此文可作為碩士論文之首章，但若作為期刊論文則須加強史料立論的過程；二是建議嘗試從比較角度出發，如比較澳門、日本和香港的異同，以突出中共在香港的鬥爭特色，讓讀者更清晰了解香港的鬥爭如何特別。此

外，評論也提供若干方法以改進文章水平，如加入關於 1949 年以前的鬥爭脈絡、使用口述歷史材料、避免用短而概括的話語、縮小研究範圍等；最後，評論期望本文能更深入討論中共方針在香港所遇到的障礙和鬥爭方式的變化和種類，以滿足讀者的渴求。

李盈佳〈中華民國在郵票？——戰後臺灣的郵票發行〉中指出，郵票在戰後臺灣與黨國體制下的中華民國有密切關係，1945 年夏天，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脫離日本統治，並開始全面承載全新的黨國制度與想像。此文嘗試回答以下問題：黨國體制覆蓋臺灣的過程如何反映在郵票的發行上？當時所通行的郵票式樣及其決定的過程？郵票從籌印到發行經歷流程、時間和困難等等。此文在回顧 1945 年以降臺灣郵票發行中，可以看到中華民國的郵政主管機關面對日本在臺政權統治痕跡的策略是從覆蓋到取代，郵票發程序則是從完全不公開趨向一定程度的公開。每一套新郵票皆需經過一定的程序方能問世，而在程序進行以後，也有郵票未能面世，作者認為能夠「脫穎而出」的主題是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的，並進一步提出以往的郵票主題是「以傳統文化及民俗活動為經，社會脈動及自然生態為緯，並權衡世界潮流，配合國內外重大慶典活動作為發行的考量」的假設。

吳俊瑩在評論時，讚賞此文反映了作者選例能力十分出色，而且擅於闡釋，能在有限材料下發揮作者獨有的觀察力。同時，也

有若干可以改進之處：1、文中起始用多達5行鋪陳郵票對過去社會的重要性，原因在於今天對郵票的感覺與以往是不同的，若能加以縮減，將可使文章的主題和內容更加平衡；2、大綱和文章內容可更緊扣，如文中多是引用報章或官方出版品之結論，作者僅作總結式介紹，未見深入分析，難免可惜；3、詮釋上有一些過度推論之處，如提出戰後在郵票上加蓋「中華民國臺灣省」是為了覆蓋或消抹日本的痕跡，但若考慮到郵票是有價票券，故在舊郵票被消耗或兌換前，使用舊郵票更像是臨時措施而不是有額外政治意圖；4、題目「中華民國在郵票？」中隱藏了兩個矛盾的含義：「中華民國在郵票裡面」和「中華民國不在郵票裡面」，這不利讀者理解，故可加以釐清，而讀者也容易誤解此文的內容主要討論郵票主題的類型、數據統計分析或郵票承載的內容等，但文中討論的多是臺灣幾套郵票的發行過程，沒有為上述主題加以集中討論；5、本文也缺少運用檔案材料，如檔案管理局的「郵票印製卷」，建議作者在討論郵票發行過程時可尋找討論過程的會議紀錄，避免論證薄弱。

三、地域、空間與論述

第二場「地域、空間與論述」則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暨《史原》主編許秀孟主持，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沈雪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曹依婷

和陳皓昕，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蔡明純報告，並分別由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分校內陸歐亞學系博士候選人蔡偉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陳建守、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侯嘉星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翁稷安評論。

沈雪晨在〈帝國邊疆的時空建構——清乾隆朝平定準噶爾碑刻研究〉的報告中指出，此文是在解讀《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碑》、《準噶爾勒銘格登山碑》、《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後碑》4座紀功碑碑文的基礎上，梳理了乾隆帝平定準噶爾部的歷史，著重分析「立碑」在體現乾隆帝作為盛清統治者對疆域的界定、帝國擴張的認知和正統性的構建中所具有的理念。此文首先指出乾隆帝在聲稱自己是「天下共主」的同時，對新增疆域的界定和鞏固上採取了針對沙俄和準噶爾人的務實舉措，體現了前近代帝國明確的疆域觀念，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天下觀」；其次，乾隆帝在帝國擴張過程中對新的統治地區所採取的話語和策略中，一方面強調「天意授權」和「教化使命」，另一方面採取強有力的軍事管控和相對直接的統治，與近世歐洲列強的新帝國主義策略遙相呼應；最後，平定準噶爾戰爭與清朝正統性存在密切關聯，這時乾隆帝對「大一統」的政治宣傳目的已經超過對疆域擴張的興趣，一方面體現了戰爭初期用兵急進的冒險色彩，另一方面

也使其洞察不周，最終不得不以殘酷的手段消滅準噶爾汗國。因此，此文通過平定準噶爾期間的「立碑」活動體現了「天下觀」、「天道意識」、「大一統」等概念的發展及其在帝國擴張中的運用，使讀者重新認識清朝新疆統治政策的源頭和演變。

蔡偉傑表示很榮幸能參與是次會議，並樂於給予建議。評論指出此文把焦點放在「立碑」及其象徵意義之上，以討論清朝新疆統治政策的源頭和演變為目的，但對「源頭」的探討甚少，可加以增強。而評論從「立碑」的象徵意義出發，建議文章可加強對碑文的關注，因為文中所引用巫鴻關於「紀念碑性」的研究，所指多是禮器，與文章的討論對象「紀功碑」有所差異。巫鴻的討論是以宏偉、形制所帶給觀眾的感受和象徵意義為主題，但紀功碑本身是以文字傳達相關的涵義，而文中沒有對文字，包括碑文的多語性進行深入討論，建議如若想在相關領域有所突破，則必須考慮其他語言所表達出來的效果，及其受眾：滿、漢、蒙、回、藏等族群觀感的差別，這樣將更能深入說明紀功碑對皇帝及其不同臣民的意義和管治政策之間的差異。

曹依婷〈從「海外之民」到「吾國之僑民」——晚清的華僑觀念與論述〉試圖從美國排華事件而引發晚清中國的抵制美貨愛國事件，以及1900年到1910年間革命派、維新派以及其他報刊有關華僑的記載出發，試圖分析「海外同胞」、「華民」、「吾

僑」、「華僑」這些關鍵詞的涵義變化，指出「華僑與祖國」的關係並非自然存在，而是為特殊目的而建構。文中指出「母國」與「僑民」的關係是隨著各種條件的協調而成的，而抵制美貨事件的背景是一個正在崩解的大清帝國，面臨對其正統性的嚴重挑戰，1909年《大清國籍條例》的生成背景便代表當時關於雙重國籍的華僑爭議。「華僑」一詞的出現意味著僑務工作的形成，表示清政府從「天朝」變成「萬國」之一，是一種重新自我定位及適應方式，也對內展現了對其海內外子民的管理權力，然後，隨著「中國」想像成型，「華僑」、「海外同胞」或者「海外華人」逐漸被納入為一個整體加以論述。最後，作者通過「祖國」和「華僑」語義上的緊密連結，提問：誰是華僑？誰是誰的華僑？

陳建守在評論中指出這是一篇正在進行中的論文，非常樂意給予各種不同的建議以供作者參考，讓論文更趨完善。1、此文延續楊瑞松之研究，也深受其關於從宗族到國族之間的意象變化過程研究之影響，建議作者可進一步參考馮客（Frank Dikötter）和奇邁可（Michael Keevak）《成為黃種人》等研究讓此文論述更加豐富；2、在寫作上，文中有一些較為「跳躍」的地方可以改進，如解讀引文時加入了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的解釋，不過讀者卻未見可佐證解釋的語句，社會達爾文主義也許在事實上影響當時的中國，但不代表原本中國社會本身沒有類

似的思想，所以作者的推論可能把「事件的邏輯」和「史家的邏輯」混淆，以後來發生的影響推導之前的歷史背景，而類似問題在文中討論梁啟超和天演論之關係時也有出現，評論建議可從殖民和半殖民主義出發，如文中所引潘光哲之研究一般，將可使邏輯更流暢，立論更適切；3、此文精彩之處在於討論維新派與革命派如何挪用「華僑」論述，但若能確定所引小說為維新派的論述會更好；4、文中也提到革命派借由排華事件突顯晚清政府的無能，而這時華僑一詞只包含漢族，這是一個特別且有意思的觀點，建議作者在碩士論文中多加琢磨發揮；最後、在文末「誰是華僑？誰是誰的華僑？」的提問中，評論建議必須注意「華僑」、「祖國」這些詞彙內涵是層疊式，是在歷史的發展中漸漸積累而成的，故未必可以清晰指明對象。

陳皓昕在〈「食」在華北：抗戰時期華北經濟秩序述論（1936-1945）〉以華北的研究對象，並以糧食經濟為核心，嘗試在現有關於淪陷區糧食與江南飲食業的資料上，除了補充華北糧食經濟研究外，也為淪陷區的南北經濟建立一連貫、整體的印象。文中指出戰時華北糧食短缺，政府實行管制措施並大量進口糧食，但由於政策以服務戰爭為主，使民間物資出現種類和地區不平衡的現象，加速了走私貿易的發展。這種走私貿易也異於一般私人貿易，而是由官方與民間所共同操控、經營以獲取物資或資金的貿易，

當中則以獲利快、效益高的鴉片貿易最受各集團歡迎，故不論日本、中共和民間組織皆積極推動鴉片貿易。農民一方面面對政府壓迫，另一方面受鴉片的高效利益所誘惑而種植鴉片，使華北農產品入超更趨嚴重，故抗戰時期華北經濟並沒有像華南、華中經濟一樣出現畸形繁榮，也許可以反過來說，華北為周邊地區的畸形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

侯嘉星讚賞此文在經濟史方向上選擇了比較少被討論的話題，即對政治軍事史以外的社會生活進行探討，而通過對華北不同政權比較，並利用鴉片把文中觀點串連起來，是文章比較突出的地方，建議可從以下幾點進行改善：1、在此文線索鋪開過度，讓焦點模糊，而從經濟史角度看，建議在生產、分配中兩者選其一以建立焦點，將比文中兼論兩者為好；2、在抗戰的特殊時空背景下，本文似可更深入考慮戰略活動、交通管制、通貨膨脹、資訊交換等大環境對經濟秩序的影響，讓文章內容更為平衡；3、此文多採用單一史料，故建議可多使用華北政務委員會檔案、華北地方報紙等以充實論據；4、戰時華北政務委員會管理範圍為山東、河南和陝西，而文中未把陝西視為華北一部分，似可改進，若因此而導致選取區域過大，則可以一省為研究對象；5、文中多探討經濟秩序之方式而對經濟秩序之內容較少討論，建議可進一步討論經濟秩序的制定者是誰、在經濟秩序中的公權力的角色是怎樣、當時北京政府參與制定經濟秩序的人的

想法等問題；6、文中提及華南宗族比華北細密，所以有助於進行較複雜之走私貿易，但華北宗族之力量似不比華南弱，建議加強對華北宗族之了解，讓此文論述更完善；7、此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往對抗戰歷史充滿悲情色彩的了解，但建議加入相關回顧，並舉出「刻板印象」的例子，加強說服力；最後、抗戰時期華北的政治、軍事狀況變化甚大，似有必要從政治軍事上看待其對經濟秩序之影響，讓脈絡更完整。

蔡明純〈晚清海外遊歷與近代旅行文化——以清代經世文編對「遊歷」認識的擴大與變遷為討論中心〉一文，以清代的幾部經世文編為中心，並配合奏議、報刊時論與當時出版問世的出使日記等文獻，以形構海外遊歷作為當時知識分子在追求世界經驗的過程中，實際旅行經驗與相關議論、出版媒體所產生的互動，從而梳理出19世紀以來海外旅行文化的歷史脈絡。此外，作者也希望從過往較少被旅行史研究所使用的史料出發，描畫出更為清晰的近代海外旅行文化的發展過程，為當下集中於個人遊記和日記討論分析的旅行史研究提供不同的線索；同時，也分享了作者在這些史料中所獲得的一些側面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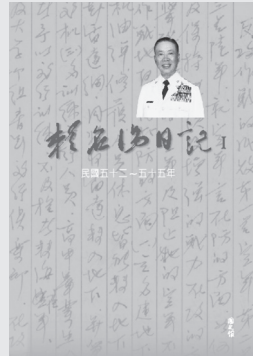
翁稷安為此文豐富而詳盡的建議，在評論中首先指出晚清由「天下」到「世界」的世界觀雖然已被學界廣泛研究，而使用的經世文編也是被廣泛使用，但此文高明之處在於通過新的角度，即從「旅行」去看天

下和世界，從舊的說法中找出新的意義。評論進一步指出由於是從舊資料出發，珠玉在前，故必須注意兩點：1、要非常嚴格地定義概念，如什麼是旅行？採用定義的準則是什麼？方可與前人研究並列；2、必須要與舊說法進行嚴格對話，像跟相關研究者如黃克武的研究對話，同時也要與經世文編的背景、編者和預期讀者對話，而應予注意的是，因為經世文編的編集目的並非「旅行」本身，所以文章必須要分辨編者和文章著者之意思，如編者認為出國是為了使國家富強，但著者卻可能只是為了升官發財才賺取出國經驗，理清兩者關係將可避免誤讀文意。此外，評論也給了各種意見以從多方面豐富論文內容，包括：1、嘗試在問題意識上與從事相關主題研究的學者，如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中關於「明清城市休閒消費活動改變城市空間結構」的觀點對話，從而建立不止適用於清代，也可與明代溝通的問題意識；2、作者在文中展現了明顯的現實關懷，這是很好的出發點，也是歷史學者所應注意的，但若要使文章焦點集中，似可將重點放在副標題「以清代經世文編對『遊歷』認識的擴大與變遷」之上，讓內容緊扣；最後，評論認為若能對出國遊歷前需要做什麼準備、以什麼方式出國、有什麼手續加以詳細闡述，本文將更完整。

四、結語

本次會議秉持提供跨校交流的討論場域，藉由《史原》、《政大史粹》及《史耘》三刊物的人力與行政合作，讓研究生能彼此切磋，以後將更進一步籌組和連結各領域讀書會，用心之遠，澤被同儕。本次會議十分成功，會議為與會者提供了無微不至的幫助，如為未能出席之報告人安排視訊對話，讓未及赴會的同學不致錯失學習機會，而由於與會文章皆屬工作坊性質，故多有可待改善之處，但學長、學姐們不嫌鄙陋，皆熱情積極地給予寶貴意見，讓後學獲益良多，既有益於日後博、碩士論文之寫作，更有益於長遠之學術研究。本會議為尚待發表之論文提供難得之交流機會，讓研究生跨出校園，交流彼此觀點和實驗性的論文構想，提升臺灣研究生發表和研究專題的能力和風氣，如能持續舉辦，必能在增進研究生間友誼之餘，更名為歷史學提供持續發展的人才和動力。

出版資訊



賴名湯日記

著者：賴名湯

編輯校訂：葉惠芬、林秋敏、周美華

2016年12月初版

精裝第1、2冊各750元

本書係依據賴名湯日記原件重新打字排版而成，第1冊為民國52年至55年日記，第2冊為民國56至60年日記，全書敘述賴將軍任聯勤總司令與空軍總司令要職期間，領導統御、軍事建設與反攻大陸政策所作的努力。他如實地敘述所面臨的軍中問題與困難，也顯示他爭取美援、生產武器或軍事裝備的努力。特別是出身空軍的他，對整頓空軍更有一份使命感，不惜以「跳火坑」的熱情，致力改革空軍及發展航空工業，成績斐然。因此本日記的出版，一方面有助於了解賴名湯將軍本人的勳業與功績，也可一探其家庭生活、內心想法、宗教信仰、休閒娛樂等私領域部分；另一方面，對於此時的軍事措施或反攻大陸困境而言，本日記亦可提供史料，作為研究者的參考。

訂購詳見「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頁244）